第一章

引論

JPC HK

大家常有的印象是，中國武術經不同族群的貢獻和數千年累積，發展成複雜多姿，集格鬥、健體、醫學和心靈修煉等元素於一體的系統。各種武術元素，從遠古開始形成，而且在互相滲透之下有機地發展。從先秦為起點，直至冷兵器退出歷史舞台為止，軍事、民間武技和身心修養各種元素早已融為一體。[1] 以色列學者夏維明（Meir Shahar）對少林武術也有以下觀察：「我們今天所熟識的拳術不是為狹隘的戰鬥而設計，而是廣泛應用於健身強體和精神修煉。原本用於醫療和宗教目的的體操術和呼吸術被融入拳術，最終形成集技擊、治療和宗教修煉於一身的綜合體。」[2] 問題在於，這些不同因素，是同步發展還是在不同階段陸續成為中國武術的成分？我們對中國武術的一體性印象是從何而來？

自古以來，武力毫無疑問用於人與人、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鬥爭，不難明白格鬥和健體早已經是武術的核心。但由於功用不同，用於國防的武術（簡稱軍旅武術）和用於民間的武術（簡稱民間武術）側重點和訓練

方法不盡相同。兩者明顯沿著兩條路徑發展，不少人類推兩者互相交流影響，但相關的記錄有限，深入的討論亦不多見。我們可以估計武功高強的英雄豪傑會通過各種諸如武舉的制度被朝廷聘用，南征北討；解甲歸田的士兵，亦能將軍旅所習武藝用於自衛，但這是常理的推測，少有文獻充分解釋與證明。至於文武合一的教育理想和哲學思想，有否刺激武藝發展或反過來吸納諸多武藝元素，文獻所見同樣稀少。事實上，孔子提倡「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一種體性的教育，他自己佩劍，其弟子冉求和子路精通武術。同時，古代的士出身貴族，集知識和管治本領於一身，堪稱文武合一。觀先秦以後，文士階層討論武藝以至健身的材料有限。習雲太對此趨勢有以下解釋：

>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士內容日益增多，又不能廢武事，於是文武兼包之士逐漸分途為二：憚用力者歸「儒」，好用力者為「俠」，亦即儒者專於文，俠者專於武……文武分途後，文人輕武，武者不文。專門從事武事活動的人，對原有武術技術的提高雖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但又由於文化限制，能夠流傳後世的武術技術文字記載不多，武術技術多靠「口授身傳」往下傳，以致造成不少精微奧妙隨人而亡。專門從事文事的人，逐漸又輕武，不懂武，對武術中的攻防技術無法確切地加以紀錄，而精於武藝者又不能著書立說以闡其奧，或有述其妙者又不能解其術，故自西漢以後，武術著作已不多見。[3]

近年流行的性別研究，更讓我們瞭解到傳統社會中，武與力並非「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必然內涵。性別研究強調「女性特質」（Femininity）和「男性氣概」都是社會文化建構遠多於與生俱來的品質。不同社會因應主導群體的利益、習性和產業結構種種因素界定男女的特性，進行角色定形，並且規範兩者社會功能，進行分工，繼而按性別分配社會和文化資源。在西方文化的長流之中，男性氣概隨社會需要轉變。一夫當關，律己助人的男性英雄屹立於部族互鬥，環境嚴苛的上古世代；抵禦外敵，繼承基督教傳統的騎士在中世紀衝鋒陷陣；但到工商業文明興起，武力漸漸淡出西方男性精英的世界，克己、整潔、有禮、勤儉成家的男性得人敬重。[4] 回看中國的情況，讀書人的品行得科舉考試和家庭制度鞏固，[5] 文字記載頗為凸顯讀書人的文雅特質，平衡了英雄好漢的勇武剛烈。[6] 近年的中國男性氣概研究，都有頗多關於男性德行、文學修養、交誼、男色，以至消費行為等等文雅的一面。[7] 就是自唐代開始為中國培養武將的武舉和武學，到宋代以後也重視知

JPC HK

書帶兵，多於練武衛國，久而久之，武舉成為士子入仕的另類途徑。[8] 尚武之風一度瀰漫明代的學術圈，但同時期的武學卻充斥紈綺子弟，結果「教法不嚴，督率無力，朝廷與社會均不甚重視」。[9] 尚武、有血性，強身救國的男兒氣概觀念，到了近代，尤其在清末以後受盡列強壓迫的景況，特別被知識階層廣泛討論。[10]

明代以前，並非沒有討論軍旅武術、民間武術、武術和身心修養的材料，但記載少而零碎，而且散落在不同文體和語境中，部分更和文學創作和怪異元素混雜。今天中國武術的一體性形象，大概是一個篩選和建構的結果。有些武術元素和內涵，尤其被視為有特殊價值和中國武術獨有的，被保存、強化和發揚；一些被看成不理想和不合時宜的或被放棄，或被自然淘汰；新的和外來的因素，合用的會與既有的武術元素整合。這個過程應該一直在行進，只是之前未必有系統的陳述。我們也可以相信，因應特別的現實和文化需要，這種建構工作會特別惹人關注和受到重視。就如本書後章會講到的，明代將領在抗倭戰爭初時處於下風，也目睹日本刀法的厲害，乃反思中國軍旅武術的缺陷，在選兵練陣方面求推陳出新，革除不實用的華麗套路，並考慮取材民間兵器武術，從而發展出一些武術的新見解。在清代，武術和社會運動有密切關係，民間的社會運動首領要招徠群眾加入武力抗爭，既鼓勵習武，也利用信仰傳說，做成各種疑幻似真的傳奇，令武術染上怪異色彩。當然，從清末到民國時期，武術發展成國術，在政策、文化和武術界人士的配合下，成為新時代政治和文化的一部分，建構和篩選的過程是特別清晰。武術在這時候負起了保種建國、健身強民、科學化、精神修養等等使命，也同時得處理一些舊元素如門派與武林傳說。方向雖然看似清晰，但政策的持久力、參與者的背景和個人目標、整個武術界的複雜氛圍，使發展未如預期，而且引發了不少矛盾。1937 年之後，政治局面大變，國術運動失去了之前的動力。

以下六章會鋪陳近代建構武術的歷程。第二章講述傳統文獻對武術的記載重點，旨在指出既有資料不容易表現出前人對武術有一種一體的概念。第三章嘗試審視明、清時代的主要武術風尚，從而指出就是在這兩個被一致認為是中國武術歷史的重要階段，都只有個別的武術元素得到較完整的發展和清晰的記錄。而這些元素卻在晚清開始面對挑戰和自然淘汰。第四章討論傳統武術，如何踏進民國文化和政治重建與借鑑西方科學與體育這兩個主旋律，並且開始調適和改革。第五章從馬良的新武術、中國精武體操會和其他新興武術團體的興作，看 1910 至 1920 年代中國武術轉化的方向，和體育化與科學化的實效。第六章以中央國術館及其相關國術館的發展為主題，探討新開創的國術的核心內容和推

進方式。當中強調的科學驗證、去除門戶和身心修養，和傳統武術產生什麼張力，實際又得到什麼結果。第七章以四十年代武術在幾個地區的發展作結，意圖指出在沒有政府主導的情況下，武術回歸原生態的發展，一些之前強化的元素情況如何，未解的問題又如何延續。

前人在這課題的研究包羅萬有，本書儘量取用，同時參考民國時期出版的專著和期刊。武術、武藝、功夫、國技和國術這些名詞，長時期被交替使用，學者亦盡力闡明。為免走進太複雜的討論，本書以武術為一個大概念，民國之前的軍事訓練會特別指明為軍旅武術，民間使用的為民間武術，也會用武藝來形容個別人的修為。晚清民初時，武術家常交替使用武術、國術和國技這幾個名詞，本書引用相關作者的作品時，會保留原有用詞，但討論時則儘量使用普及了解的武術一詞。在張之江鼓吹下，國術一詞深入民心，所以 1928 年後由中央國術館和相關組織推動的武術活動就會以國術名之。這些用法不一定完善，只求切合本書論述的方式。

注釋

1 類似講法見於任海：《中國古代武術》（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和林伯原：《中國武術史》（新北：五洲出版有限公司，2012）等作品。

2 （以）夏維明著，趙殿紅譯：《少林寺：歷史、宗教與武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頁 173。

3 習雲太：《中國武術史》（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85），頁 34-35。

4 Chris Blazina, *The Cultural Myth of Masculinit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對西方男性形象的轉化有扼要的討論。

5 Song Geng, *The Fragile Scholar: Power and Masculinity in Chinese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論中國科舉和教育的作品，多不勝數，顯要者推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何宇軒的近作《明清女性在男性人格建構過程中的角色》（台北：秀威出版社，2019）有趣地指出，母子、夫婦、姊弟的關係如何塑造出求道、立德，有志向的男兒性格。

6 Kam Louie, *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

7 例如 Anna M. Shields, *One Who Knows Me: Friendship and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范育菁：〈風俗與法律：十七世紀中國的男風與男風論述〉（台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0）；巫仁恕：《優遊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等，都凸顯出傳統中國男性的文雅。

8 方震華：〈文武糾結的困境——宋代的武學與武舉〉，《台大歷史學報》期 33（2004），頁 9。

9 賴盟騏：〈明代的武學與武舉制度〉，《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學報》期 33（2004），頁 208。

10 Lili Zhou 的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in China, 1897-193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2012) 討論了武力、體魄、獨立性格、知識，科技等等因素如何在內憂外患的中國，成為男性氣概的新內涵。王詩穎的《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 1924-1945》（台北：國史館，2011）進一步指出清末民初的連年戰亂造就了「由文轉武」、「好男要當兵」的新男性形象。